

海外远程华文教育的专业设置及教材编写

耿 虎

提要 海外远程华文教育是由海外函授华文教育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教育形式,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华文专业的设置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华文教育的教材虽多,但真正体现华文专业的特色,符合远程教育要求的并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着重就华文专业的应有特色及教材编写展开探讨,期望能有益于新世纪海外远程华文专业教育的学科建设。

海外远程华文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里的应用,由过去的海外函授华文教育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教育形式。说它新,是因为基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和时代的发展,其教学手段、方式、对象、目的、乃至教学理念,与以往的函授教育相比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可以说这是传统的函授教育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和变革。抓住这次转型和变革,适时地搞好远程华文教育自身的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对于促进海外远程华文教育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学科建设角度,就海外华文教育中的专业设置和教材编写谈一些看法。

追溯海外远程华文教育的历史,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时称华侨函授部)正式面向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华侨华人)招收函授生,这是新中国有组织地开展海外函授华文教育之始。^①自此之后,华文一直是中国对外教育的重要内容,函授教学也一直是对外教学的重要形式之一。由于受到客观上的地域限制和在职工作的影响,函授教学自创办以后深受海外学员的欢迎,一段时期以来,在实际的招生中,长期进修的函授生也往往多于短期培训的面授生。因此,搞好函授教学对于海外华文教育来讲,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自上个世纪末,现代化信息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教学领域,受此影响,传统的函授教学逐渐向新的远程教学过渡。远程华文教育与过去的函授教育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教学手段上讲,现代化的网络联系代替了过去的邮政通信,教学双方的沟通交流更为便捷;从教学方式上讲,过去一对一的个体教学逐渐变为面向全体学生的资源共享,方式方法更加灵活多样;从教学对象上讲,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老一辈海外移民中的第三、四代华侨华人已逐渐成为教学的主体,此外还有部分的新移民和非华裔人士参与,教育面更趋扩大,生源背景更趋复杂;从教学目的上讲,过去旨在传承中华文化,现在则是传承中华文化与培养具有中华气质的当地公民兼而有之;从教学理念上讲,已往的华文教育多被视为华族本民族之内的事,是完全的母语教学,如今则更为注重如何将华文教育融入当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教学媒介语更多地被定位于介于母语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之间。以上这些新变化,为我们全面考察和合理把握新时期海外远程华文教育的特性,做好华文教育工作,提供了许多新思路和新视角。需要研究的问题不少,应当改进的地方颇多,但

联系已往函授华文教学,新的海外远程华文教育,当务之急恐怕还是应从自身的学科建设入手,认真解决好专业设置和教材编写两个问题。

专业设置是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学科成熟的一个基本标志。纵观海外函授华文教育的历史,华文专业教育虽然已开展有年,但在对“华文”一词的理解上,长期以来却未尽一致,在华文专业的课程设置上,更是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在“华文”理解上的分歧,概括起来有所谓广义与狭义之分。主张广义者,认为“华文”指的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化,开展华文教育不仅仅应进行民族语言教育,还应重视民族文化教育;主张狭义者,有的认为“华文”指的是中华民族语言,有的认为指的是中国语言文字,还有的认为指的是中国语言文学,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字或文学的教育中传承中华文化。理解上的分歧,造成了教育教学上的某些混乱。虽名为“华文教育”,其实是你教你的,我教我的,各取所需,各搞一套;或虽名为“华文专业”,其课程设置实际上是照搬国内一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体现不出华文应有的专业特色。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华文教育教学界的沟通交流,而且对于华文的世界传播不利。全面准确地把握华文及华文教育的应有内涵,从课程设置入手,尽快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华文专业,使海外华文专业教育早日走上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学科发展轨道,是目前摆在广大华文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我们认为,作为专业教育来讲,狭义地理解“华文”一词是不够妥当的。“华文”应是汉语和中华文化的简称。语言与文化是华文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华文教育的两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华文和华文教育中的文化既包括物质方面的成就也包括精神方面的成就,即使是单纯精神方面的成就也有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科技、教育、艺术、风俗以及价值观等诸多内容。简单以中国语言或汉语言文字来概括华文或华文教育都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全面的。这样做,实际上是以语言文字教学来代替文化教学;人为地缩小了华文教育的涵盖面。至于认为华文乃汉语言文学者,则是以国内一般的中文教学代替华文教学,抹杀了华文教育的特性。因此,狭义的华文及华文教育观,不仅未能充分反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总体面貌,亦未能很好地体现华文教育的宗旨,故此是不可取的。那么,是不是对华文及华文教育作广义的理解就可以了?联系我们的教学实践,只将理解停留在广义的认识层面或观念层面仍是不够的。只有将这种认识或观念上升到应有的专业和学科建设的高度,落实到具体的课程设置,制定出一套体现“华文”专业特点的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使教学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才有实际的意义。鉴于华文教育的特定内涵及专业课程设置的具体要求,我们认为面向海外的华文专业应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华文教育不同于国内一般的语言、语言文字或语言文学教育,它有着更为宽泛的内容。

(2)华文教育的内容虽较为宽泛,但应围绕着语言与文化这一中心设置相对固定的必修课程和自由度较大的选修课程,这是其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基本要求和标志。

(3)必修语言类课程,应在具有一定程度的交际汉语基础上充实语音、汉字、词汇、语法、修辞等专业知识。必修文化类课程,首先应从语言的角度设置课程,体现出由语言到文化的过渡与衔接;其次应在文化领域中做出合理的选择,精神方面的文化成就应当成为首选和重点内容。

(4)选修课程的设置,应从汉语言及中华文化这一大方向出发,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不仅选修的内容可适当放宽,而且还应根据海外不同地域的特点及学生的兴趣要求开出富有特色的多样性课程。诸如经贸、旅游等实用性课程,中国历史、当代国情等基础性课程,华侨华人与中外交往等专门性课程等,都可纳入选修的范围。选修内容的设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因时因需变化不断调整的过程,只有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和自由度,才能使整个海外华文专业教育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5)无论是必修还是选修,课程难度一定要照顾到教学对象的知识和能力结构,课程内容务必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详略得当。与课程设置相配套,应针对专业特点编写出一套系统完备的系列新教材来组织开展教学活动。

教材是课程设置的具体体现,也是开展专业教育的基本依据,尤其是对远程教育来讲,科学实用的教材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教材编写上,过去我们曾做出过不小的努力,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但客观地看,过去所编教材虽多,真正体现现代远程教育特点、符合华文专业要求的教材并不多见。这当然与新的远程教育才刚刚起步、人们在华文专业的理解上又存有较大的分歧有关。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与探索,目前我们对海外远程教育的特点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对华文专业的理解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也已渐趋达成一致,^②因此,编写新教材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再不行动起来,或仍沿用以往的老教材,则将影响教学效果,不利于事业的发展。下面就联系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历年编写中文函授教材的一些情况,谈谈新教材编写的有关问题。

首先,是坚持自编,还是选用国内现有相关教材取而代之?

这实际上牵扯到对海外远程华文专业教育学科的认识问题。如果从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的角度讲,选用国内现有教材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尚可,长期如此是不够合适的。其一,从理论上讲,任何学科和专业都有其明显的学科独立性和特性,相应地任何教材也都有其针对性和适用面,海外远程华文专业教育无论从教学对象、教学目的,还是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来讲,都与国内一般的相关教育有着明显的不同,以国内相关教育的教材作为教材,实际上是抹杀了海外远程华文专业教育的特性,不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专业来看待。其二,从现实的角度说,由于海外华文教育的教学对象情况复杂,其教学形式也灵活多样,即使是在国内相关领域中,也很难找到完全适合的教材。国内一般的教育自不待言,就是已往的海外函授华文教育,在新的情况下其教材的不适用性也是很明显的。其三,选用其它教材,必然造成东拼西凑,这于专业上的系统配套要求是不符合的,甚者还会造成教学上的混乱。其四,联系以往的成功办学经验,只有自己编写出的教材,才最适合教学情况,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在这方面,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文函授教材的编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厦大海外教育学院的中文函授教育之所以长期以来开展得有声有色,广受海外学员的欢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其自编教材能从海外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性强,符合海外的学习需要。也正是以这套教材为依托,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才得以开展,风格独具的教学特色才得以形成。因此,坚持教材的自我编写,既是学科建设的要求,也是教学实际的需要。我们应该借鉴以往好的经验,发扬以往好的传统,自己动手,编写出一套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新教材,为学科和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时代赋予新时期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的一项义不

容辞的光荣任务。

其次,应如何正确处理新教材与老教材之间的关系?是彻底丢弃老教材,推倒重来,还是吸收其仍然有益的合理成分,以此为参考,进行重新编写(或曰全面修订)?

这就涉及到对以往老教材的评价问题。在函授华文教育阶段,尽管人们在华文理解上有所分歧,在专业定位上也不太准确与规范,但还是编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材。仍以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所编中文函授教材为例,围绕着中国语言文学这一专业,其所编教材就达22种之多。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海外华文教育的初始阶段,能在短时间内群策群力编写出这样一套教材,对于华文教育的开展,功不可没。客观地看,这套教材也还是符合当时教学对象的学习要求的,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起到了应有的作用:(1)及时满足了当时海外华侨华人(特别是第一、二代)学习华文的愿望和要求;(2)培养了大量的海外华文人才,使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没有出现断层或断层;(3)从总体上说,专业设置明确(中国语言文学),课程配套合理,内容和难度照顾到了当时学习者的接受情况,取舍得当,难易适中。当然,在肯定传统教材成绩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随着学科和事业的发展,传统教材的不适用性也是十分明显的:(1)由于专业定位是中国语言文学,其课程设置多半是照搬国内的中文专业,从严格意义上讲,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华文专业,自然也就体现不出华文专业的应有特点;(2)即使是中国语言文学教育,由于目前教学对象的改变,其内容和难度也已显繁琐艰深,不够简明;(3)未能反映近廿多年来学术研究上的新成果,部分内容、观点已经过时;(5)内部刊行,装帧陈旧。以上这些不足,有些是编写思路造成的,有些是编写时间仓促造成的,但更多的还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新的海外远程华文教育的形成,老教材已经越来越不适合新的情况和新的要求。从这个角度讲,老教材的淘汰也是大势所趋,情理之中的事了。问题在于对于新教材的编写,老教材到底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新、老教材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老教材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但它仍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如在编写方法上,它坚持了从海外实际出发的编写原则,同时参考了国内同类型专业的教学大纲及相关教材;在编写体例上,设置序列教材,注意体现层次衔接的一体化课程体系;在难度把握上,照顾到了海外函授生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力求简明扼要,方便自学;在内容取舍上,注意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同提高文化素养和实用性结合起来,多保留共性经验的知识,删去不适合海外社会的内容;在教学安排上,不仅有课本,而且还有书面作业及通信答疑相配合等等。以上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合理的、有益的,足资我们借鉴与参考。其次,我们说现代远程华文教育与以往的函授教育相比已大不相同,但这并不等于说函授阶段积累起来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就已失去了意义,相反,由于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是经过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所以其对新实践更具有指导意义,更弥足珍贵。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由旧事物向新事物更新的过程,新旧事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强调新事物的发展而看不到旧事物的作用,等于是割断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孤立地看待问题。同样地,在函授教育与远程教育问题上,我们也应该坚持这种辩证的发展观。在充分肯定现代化远程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形式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新的教育形式又是由传统的函授教育发展而来的,教育形式改变了,但教育的主体内容仍是一致的。所以,在新教材编写上彻底抛开老教材的做法等于是割断历史,无视联系,是不

尊重历史经验的一种表现。既非推倒重来,也非小修小补,以老教材为蓝本,充分吸收其仍然有益的合理成分,加以科学论证,进行重新编写(或曰全面修订),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和做法。

再次,新教材编写的其它有关事宜。

1.教材编写的总体思路。

联系已往的教学,面向新的世纪,我们认为新的海外远程华文专业教材的编写应确立以下总体思路:

(1)符合海外的特点:包括海外的地域特点、生源特点、以及对外教育的目的特点等;

(2)体现远程教育的特性:包括基于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教学手段、方式、方法的新变化等;

(3)突出华文专业:包括课程体系的设置、知识与能力结构的衔接等;鉴于以往教学中存在的偏差,在这方面尤需着力加以调整与加强,至于华文专业特色具体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已见前述,在此不再重复。

2.教材编写前的准备。

指的是为确保教材的可行性与针对性,在教材编写前应充分展开详细的问卷调查,广泛听取海外学习者的意见,然后分类整理,并在教材中给以反映。

3.教材编写的领导与人员组成。

新教材的编写是一个系统工程,应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组织专门的编写人员。在编写成员中,除了应有相关领域的专家把关指导外,还应包括曾经从事过函授教学的老教师,以及目前正在远程教学第一线的新教师。老教师熟悉远距离华文教学的情况,经验丰富,新教师是现代远程教育的主力军,新教材主要靠他们去组织实施,在教材编写中充分发挥新、老教师的作用会使教材更加贴近于教学,更具实用性,同时还有利于教学连续性的保持和华文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

4.教材编写的资源整合。

华文教育是一项崇高的民族事业,她需要一切热爱中华文化的人士共同为之奋斗。作为辛勤工作在华文教育第一线的广大华文教育工作者,更应该团结起来,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华文专业教材编写上的资源整合首先是华文教育界的资源整合。只要大家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把集体的智慧集中起来,编写出一套乃至数套高质量的新教材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责无旁贷的。作为有着悠久教学历史和丰富教学经验的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来说,其自身的优势资源也不可小觑。厦门大学是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历史悠久的著名综合性大学,她不仅有着其他高校所不能比的“侨、台、特、海”的区位优势,而且还有着像南洋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这样国内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和高等教育研究基地,这是编写海外华文专业教材不可多得的学术和智力资源优势。教育历史长、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中,曾经成功编写过函授中文教材的厦大海外教育学院一定能做好新教材编写这篇大文章,为新的海外远程华文专业教育的学科建设再立新功。

总之,只要我们面向海外和新的世纪,抓住华文专业这个中心,确定好正确的编写思路,把可利用的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做到既内、外沟通,又教、学兼顾,既重理论,又很实用,

相信所编教材就一定能受到欢迎,取得成功。

注

- ①除中文专业外,当时还陆续开设了中医、数、理、化等专业的专科函授课程,参《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纪念厦大海外教育学院创办40周年》、《适应海外社会的实际需要发展独具特色的中文函授教育——海外中文函授创办40周年巡礼》(载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编《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四十年回顾与总结》,1996年内部印行)。
- ②认为华文教育为中国语言文化教育或在华文教育中应重视中国文化教学的观点,近年来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赞同,如汤翠英《开展华文教育工作之浅见》,载《侨务工作研究》1996年第1期;潘懋元、张应强《海外华文教育与弘扬中华文化》,载《教育研究》1996年第3期;李方《含有母语基因的非母语教学——海外华文教育管见》,载《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3期;李嘉郁《对华文教育中文化问题的几点认识》,载《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1期;贾益民《印尼华文教育的几个问题》,载《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等等。

参考文献

- ①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编:《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四十年回顾与总结》,1996年内部印行。
- ②厦门大学海外函授学院编系列函授中文教材,内部印行。
- ③林蒲田主编:1995年,《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
- ④吕必松:1990年,《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⑤张楚廷:1999年,《教学论纲》,高等教育出版社。

(耿 虎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上接第31页)

五、结 语

以上从语用学角度对汉语拒绝言语行为作了一番分析。从中可见,拒绝策略后面有着深刻的语用理论基础,即“礼貌原则”和“面子论”。我们认为,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向学生介绍一些汉语的拒绝策略及相关的语用理论,加强学生在运用汉语进行交际时的得体性。

参考文献

1. 何自然:1988,《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2. 何兆熊:2000,《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 顾曰国:1992,《礼貌、语用和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第四期。
4. 秋 月:1993,《关于礼貌策略的实例分析》,《外语学刊》第四期。

(王凤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留学生部)